

明鏡

文丛

- “甲肝”备忘录
- 警惕！性病在蔓延……
- 剪辑刀下的报告
- 半裸的世界
- 中国婚床
- 上帝创造女人

1

5
/2:1

88

BRIGHT MIRROR



明镜

BRIGHT MIRROR

B284/12



1988年第1辑

文丛

目录

大特写	“甲肝”备忘录.....秦晓霞 屈之的	2
社会热点	警惕! 性病在蔓延 ——一份有关性病防治的报告.....弗智平	7
文化透视	剪辑刀下的报告 ——对一种电影现象的思考.....应 音	10
法庭内外	黄宗英的债务“官司”.....郭洁友	13
当代生活	含着微笑离婚 ——一个民政调解员的手记.....蔡洪平	16
婚姻与爱情	上海青年婚仪新潮.....张梅君 常 晨	21
当代大学生	半裸的世界 ——来自现代学府的近距离报道.....陈鸣华 姜 峰	26
环球瞭望	古老而年轻的俄罗斯 ——访问苏联纪实.....斯琴高娃	28
广角镜	古宅风波 ——著名京剧艺术家周信芳遗产诉讼案.....李立人	57
名人爱情	世纪之恋 ——温莎公爵夫人回忆录.....胡 凡编译	32
人物传记	上帝创造女人 ——法国名导演罗杰·瓦迪姆传记《从一颗星到另一颗星》摘译.....路 明译	54
世界风云	地狱之门 ——世界动乱地区的美国女记者.....朱 莹	38
中国民俗	中国婚床(三章).....李 林	40
域外文化	雅皮士的世界 ——美国八十年代文化侧影.....[美] 玛丽莎·皮斯曼 著 玛拉利·哈特勒 著 郭彦易 丹节译	48
诗海一粟	枕 头.....夏 门 远与近.....夏 门 求 索.....彭小梅 初潮的日子.....朱金晨	22 37 56
影视之窗	里根养子寻母记.....李 健	51
电影小说	罪恶世界.....林 岚编译	59

《明镜》文丛第一辑
《明镜》文丛编委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张: 4 字数: 120000
印数: 1—90000

责任编辑 赵孝思
封面设计 范 夫
封 面 摄影作品
封二、封三 外国新潮画欣赏
封 底 外国影星

ISBN 7-5426-0179-2/I·32

定价: 1.40 元

B 573551



备忘录

□秦晓鹰 屈之的

●大特写●

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车轮的飞驰、滚动。归根结底，只有人和人所生存的社会全方位的进步，才是真正的发展。如果一个民族，连自己寄身于其中的群体环境都不会保护、治理和控制，那实在太可悲了，还谈什么文明，谈什么现代化？

——摘自调查随笔

人类究竟有没有健忘症，我们并不清楚，更不知道是否应如耶托所云“以豹血淋之”来加以治疗。但是，在上海，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在那大城市特有的纷杂和喧闹特别是在那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的人群里，我却实实在在地感到一种真正的健忘：似乎忘记仅仅几个月前还在这座城市蔓延肆虐的甲型肝炎，忘记了这场从口而入的瘟疫。

但是，甲肝并没有消声匿迹！在市防疫站的统计表上，疫情曲线像一种背上长满巨齿的恐龙，拖着一条粗壮的尾巴；这表明，每天仍有二至三百新的甲肝患者入院，发病率仍高于常态。

在上海，在今天，仍有许多人为这条割不断的“粗尾巴”而忧虑，更有许多人密切地监视着下一步的事态。

这是副市长谢丽娟，1961年大学毕业的知识女性，她睁大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看不见的甲肝病毒。4月10日，当卫生局把连夜赶拟的进一步加强本市食品卫生的10条意见交来时，谢丽娟第二天便主持召开了市长办公会，只用了15分钟，到会者就一致通过了这10条意见。当天下午《新民晚报》全文登出了市政府的决定。

市卫生局的同志们除了睁大眼睛盯着那看不见的瘟神，正为人们过早地放松了警惕而忧虑。4月14日，一支身着天蓝色制服的食品卫生监督员组成的巡回执法队，出现在街头。

健忘，是善良者的天性。平时，它不是美德，但也不是缺陷。然而，对灾祸的健忘难道不是一种可怕的自我麻醉吗？难道不是那种“交学费”论调的栖身之地吗？难道不是人类免疫力最厉害的腐蚀剂吗！我们在上海实地采访后，决定奉献上这份“甲肝备忘录”。

东方大都市在危机中

据记载：早在2500多年前，古希腊医祖希克拉底·氏就认识到了肝炎。这种疾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出现大流行的趋势，波及全球。近20多年来，肝炎发病率在大多数国家中，已增加至每10万人中平均有60至100人……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八年元旦刚过。1月3日中午，上海市防疫站副站长黄雨舜刚端起饭碗，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抬头看时，进来的是站里的值班医生。“黄站长，卢湾区中心医院门诊突然来了很多腹泻病人，你快去看看把！”来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黄雨舜当即拎着大衣，随着来人冒着寒风匆匆离开了家。

情况的确严重：全市各家医院不到两天时间收治腹泻病人达3000多人。下午4时左右，黄雨舜向卫生局长王道民作了汇报。王道民又向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谢丽娟报告。“什么原因？”“暂时不清楚，可能是吃毛蚶引起的。”谢丽娟沉默了，眉头越蹙越紧，最后她忧虑地说道：“老王呵，1983年那次关于毛蚶的争论我还

记忆犹新。这次可不要闹成甲肝流行。”女副市长所说的那次争论持续了两年,我们暂且按下不表。眼下,迫切的是马上通知卫生、水产、工商、公安、港务、商业等部门立即禁止销售毛蚶。当晚的《新民晚报》向全市发出了警告:吃毛蚶危险!是的,就在全市居民仍沉浸在元旦的欢乐余兴时,这一切措施争分夺秒地出台了、广播了、宣传了。然而,还是晚了,短短两周,一场海啸般的疫情把这座东方大都市卷入了灾难的深谷。

甲型肝炎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暴发、流行。自元月19日起,甲肝患者急剧增加。1月30日以后,每天新发病者达1万人以上。最高时一天竟达15000~18000人。到3月18日,累计发病人数高达292301人。死亡的幽灵,紧随瘟神伸展开黑色的翅膀:直接死于甲肝的已有11人,还会有多少丧命者,尚难预料。

医院告急!全市只有2800张传染病床位,而甲肝患者却日以万计地增加。为了应急,不仅各医院的办公室、楼道、洗澡间临时成了病房,甚至楼梯也安上了病床;全市所有可以利用的场所:礼堂、中小学教室、俱乐部、会议室、澡堂、新建的楼房,统统改成了临时病房。有的病人家属为了给家人抢到一张病床,竟然翻墙头,冲进医院,争夺,然后是占领。

药品告紧!全市所有能够防治或缓和病情的中西药,例如人血两种球蛋白和胎盘丙种球蛋白,共11万支顷刻售罄。甚至一些对甲肝没有什么疗效,只有心理安慰作用的,如板蓝根等也迅速告罄。连滋补药品如北京蜂王精、上海人参蜂王浆,乃至麦乳精这样的纯营养品等等,都属抢手、脱销之列。告急,告急!卫生部通知全国支援上海。来自全国的476万多件药品通过各种渠道火速寄至上海。

公共交通告急!1586名驾驶员、3028名售票员病倒。客运本已十分紧张的公交公司被迫减少班次,同时又从二三线的干部中抽调上百人支援第一线。公交公司已是个亏损单位,平时连占80%的应报废的汽车都换不起,这次却不能不咬着牙花去1000万元作为加班费、奖金、康复基金补贴、劳务费、生活补贴、医药费,来维持紧张的营运。如果营运停止就意味着城市瘫痪!

煤气公司告急!全公司已近1500人得病,每天仍以70人的速度直线上升。公司向市政府呼吁:紧急支援600个劳动力,增加工资基金23万元;允许把补助营养费的130万元打入成本。煤气,在这座被严寒笼罩着的城市,是光,是热,是维持城市生命的卡路里!

纺织业告急!还在疫情高峰到来之前,就已经有24,755人倒下。产值减少已在5000万元以上!

中小学、幼儿园告急!娃娃患病已逾万名,幼儿园教工倒下的已达三分之一。

饮食业告急!在被誉为“美食乐园”的上海不要说那些平日就从不知道卫生为何物的许多个体纷纷倒闭、关门,就连那些驰誉中外的饭店酒家也变得门可罗

雀。仅2月1日至5日,不到一周时间,就有3000桌酒席被退订。

其实,又何止上海呢?甲肝暴发性流行事件,极大地震惊了全国,也震动了世界。北京市委、市政府连续召开8次会议研究首都的防疫。其他省市、自治区也纷纷采取应急措施。上海周围形成了一个无形的防疫铁壁。

自然,恐惧也随着谣传飞快地传遍了全国,以致各地对沪产商品或拖延取货,或严加封存,或干脆退货。幻觉、错觉甚至使人们对上海来的信件、汇款单(尽管作过消毒处理)都感到恐慌。

龙年之初,龙的子子孙孙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扭曲的心态,坚挺的人

这场病毒导致的“大瘟疫”,变成了一场考验我们民族社会道德观的大考验。这中间的丑与美、恶与善,悲剧和喜剧都粉墨登场,尽情表演。

有的个体户,因为他们出售的毛蚶被没收和销毁而歇斯底里地叫骂;有的重病号故意抱住医生护士吐唾沫,或者将医务人员的工作服扔到地上拼命地踩,有的故意把含病毒的粪便洒在地上。还有个女病人自己占了张病床,却不许别人搬进病房,大夫来劝阻,她居然狠狠地掴了对方几个耳光。有的病人不住家里,专拣收费便宜的旅店寄宿,甚至故意住在电影院、澡堂,一天3顿饭也故意上饭店去吃,“要得病大家谁也别跑”。呜呼,搞平均主义搞惯了的人们,连得病也要吃“大锅饭”!

哪里有大自然的瘟疫,哪里就会有人类社会的瘟疫。在甲肝暴发流行时,上海某些地下交易空前活跃,“行情”看“好”。药品黑市价格一涨再涨,几板板蓝根冲剂可以换1包值六、七元的万宝路香烟或其他外烟。公家牌价20多元1支的人血两种球蛋白,猛涨到80元1支。在有的地方,甚至发展到10支两种球蛋白可以换得1台彩电!总之,不管是现代商品交换中的以钱购物,还是原始商品交换的以物易物,都使价格体系发生了倾斜。这是心理的倾斜,心态的紊乱。恐惧大大加重了心理的扭曲;而扭曲又给人们平添了无端的恐慌。

尽管有这些恶闻、无知和丑陋,然而,当您的目光审视社会全景时,您就会发现:这里更有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纯情的迸涌。就像寒梅怒放于冰雪,星汉镶嵌在夜幕。我们的人民以她特有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镇定、坚毅,以“国难见忠贞”的忘我奉献,为危难中的父老兄弟姐妹送去了关怀、援救和沁人肺腑的温馨。

从疫情发现到基本得到控制的两个多月中,上海全市卫生医疗防疫工作者,驻沪部队医务人员,以及相当一批医学院校的师生,有近10万人夜以继日与病魔搏斗。那些日子,市卫生局白天人进人出,夜间,灯火通明;每天24小时,电话铃响成一片,请示的,报告的,

询问的、求援的、采访的，从主管卫生的副市长到防疫处长，从市府机关到重点医院全配置了无线电对讲机，俨然成了准军事化的指挥系统。那些捍卫人民健康的忠实卫士，那些驱除病魔的白衣天使，在这个指挥部领导下，迅速组织成了一支效率高、行动快的军事化队伍。短短的时间内，全市病床数量从2800张骤增到14万张（包括2万张家庭病床），建立了遍布全市的近4千个隔离点、间、室；卫生教育馆在有关单位的配合下，4天内即编写、绘制、赶印了10万张甲肝防治宣传画，抢印了390万份传单，赶拍了5部电视短片、200套幻灯片。生物制品研究所紧急动员分装了3万支、赶制了10万支“两种球蛋白”。一些医院的临时工怕被传染，辞了工作，院长、党委书记和大批党、团员就自告奋勇承担了为病人端屎、端尿的护理。全市更有数千名退休、离休的老医生、老护士、老职工“请缨出征”，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工作岗位。传染病医院的一位归侨大夫，在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时，都顾不上离开岗位一刻；普陀区卫生防疫站的几个干部，5天时间竟访视了1200位病人；南市防疫科的同志们，有一天忙得赶来未沾，只好派人买来巧克力，一块块往大家嘴里塞。病人戏谑地管这叫“一天喂两次鸡”；瑞金医院7位有心肌梗死的医生，冒着随时可能的心脏病发作的危险，坚守在患者的身旁。望着那一一张张迅速消瘦下去的面孔，望着那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那一个个因超负荷运转而摇摇晃晃的身影，患者们感动了，他们分明感到在那些白大褂的后面，跳动着一颗颗金子般的心。他们把亲属送来的水果、鸡蛋塞进医生护士的手里、口袋里；拉着白衣天使们的衣角，深情地喊出了：“医生万岁！护士万岁！”

如果说，治愈疾病需要药物治疗和精心护理，那么化解瘟疫造成的心灵创伤则需要人与人之间真挚的爱！在饱受疾病折磨的上海普通百姓中，真诚、人道、爱与关怀，就像辐射的晨曦和灿烂的红烛，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温暖。

凶犯：水下摇钱树

近30万人患病，直接死于甲肝的有18人。经济损失初步估算达亿元以上，造成如此重大的灾难性结果的元凶是谁呢？全国瞩目，世界注目。在“风暴”中心的上海更是街头巷议，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的人认为是水污染造成的。是的，上海的水污染极其严重，30年前还有鱼虾蟹鳖的苏州河，已成了肮脏污浊的大臭水沟，全年12个月均为黑臭期。黄浦江，这条曾经使多少代恋人在她身畔依偎的母亲河，用自己的乳汁养育过世代代沪江人，又用自己的浪花拨动过多少游子思乡的琴音啊。可是今天，却混杂了不计其数的病毒、病菌。她的“黑臭期”也达到每年3个月。上海缺水，缺水到地下水水位下降，整个城市都往下沉的地步；上海又怕水，怕水的污染。一个记者对我

们说：“在我们喝下的每5磅水中，就有1小杯尿，1汤匙粪便。”这自然有点危言耸听，但也看得出人们的忧虑。但是，从防疫科学和流行病学的严格检验中，找不到上海市民饮用水与这次甲肝流行的直接联系。市内饮用水分别由6个水厂提供，而甲肝却是全面暴发，无明显的区域性。结论是否定。

有人说这次甲肝所以能大规模流行，是与公共交通拥挤不堪、住房条件太差有关。病毒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迅速蔓延开的。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上海，这座亚洲东海岸的明珠，早在半个世纪前，其繁华就蜚声海外。而那个时代，繁华的标志之一就是畅通无阻的交通运输和栉次鳞比的高楼大厦。这些，就连被某些人向往的香港，在50年代也只能自惭莫如。可是，几十年过去，由于那些人所共知的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原因，大上海变得陈旧黯淡了。当然我们在努力改善交通，努力为人均增加零点几平方米奋斗，努力加强车辆的保养、房屋的维修，但是人口的膨胀，资金的不足，使这一切都显得杯水车薪：当人们从“文化革命”的狂热回到现实，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时，好像突然发现这天地变得如此狭小！街道窄、住房挤，连外宾接待室、政府机关的会议室也是那么憋气。公共汽车挤得人热汗直流。道路终日堵塞，步行20分钟的路，坐车却要花上近1个小时。无疑，在这样拥挤的天地中、环境里，空气即使不恶浊也不会清爽。交叉感染当然极有条件。可是这毕竟不是甲肝暴发性流行的直接原因。用法律语言说，充其量是为罪犯提供了环境和条件。按照概率的数理原理推算，30万人的几乎同时发病，这不可能是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的结果。

剩下的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全市所有病人在短时间内食用过同一种有害食物所致。国务院卫生部、上海市卫生局、防疫站、传染病医院、生物制品研究所和10几个地方、部队防疫、卫生、科研单位，上百名专家经过周密研究，抽样化验，病毒分离和疫情分析，一致认为：肇事元凶是带有甲肝病毒的贝类海产品毛蚶。

早在1983年初，上海市防疫部门针对当时一度流行的甲肝，通过模拟实验，提出了甲肝流行与生食毛蚶有关的看法。但有关部门却持强硬的反对观点。由于双方相持不下，上级便做出了“再探再报”的决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两种观点一直相持到今年甲肝流行之时，以至于新闻媒介也被卷了进去。当然，时至今日，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已见分晓，但这代价也不是太沉重了吗？

艰难的跨越：奔向2000年

就在甲肝暴发性流行已成定局的时候，上海市防疫站副站长黄雨舜忽然接到中央某部的通知，让他立即动身来机北上，之后随团出国。黄雨舜急得抓耳挠腮。这位49岁，1963年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中年汉

子，竟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收拾行装。在全市人民遇到疫情空前威胁的时候，偏偏得到这种盼望已久的出国考察机会，真使他作难。不能去！再好的机会也不行！他请示卫生局，又请示北京。回答是：心情可以理解，行程可以适当缩短，但不能改变。因为已经签了协议，不去，有碍国家信誉。黄雨舜从命了，带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内疚和矛盾心理，踏上了飞往大洋洲的航班飞机。

在风景秀丽的新西兰的那些日子里，黄雨舜无论是参观绿草如茵的牧场，还是漫步于鲜花吐艳、含翠欲滴的奥克兰街道；无论是考察一尘不染的检疫所，还是在翻阅从计算机里输出的研究资料，他都痛切地感到：我们国家的卫生防疫、环境保护、医疗水平等方面，与世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距啊！

就从卫生经费在国民总支出的比例说吧：西德为18.7%，瑞士为18.1%，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接近10%，而我们仅有2.97%。亚洲的伊朗、菲律宾、越南都是我们的两倍多。甚至非洲的肯尼亚都超过我国近1倍半。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经费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以上。至于说到卫生防疫经费，如果考虑到我国人口多、国民总产值基数低，扣除专业队伍的人头费，那么平均到全国每个人身上，大约就只剩下5角钱了！5角钱，只能买两根半雪糕。这样可怜的经费，怎么培养训练一支适应10亿人大国需要的卫生医疗防疫队伍呢？怎么能在我国迈向21世纪的时候，为保护生产力提供坚强的健康屏障呢？

在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中，又何止一个黄雨舜在为此焦虑不安。

刚刚就职的上海市长朱镕基，曾经是2000年的中国发展战略起草人之一。他一到任，就大声疾呼：必须吸取这次甲肝暴发的惨痛教训，必须高度重视卫生医疗防疫工作。卫生部一位领导同志说：“食品卫生是要命的事情。我现在就像坐在火山口上，眼看着四处冒烟，不知什么时候，还要出大乱子。”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危言耸听，制造恐慌。

请看看当前直接危及中国人民生命健康的环境污染和其他恶性疾病发生流行的情况吧！

全国每年有300多亿吨生活污水和1.5亿吨粪便污水，几乎未经无害化处理即排入江河湖海或作肥料浇灌了农田。如果不根本解决粪便污水的治理，今天在上海闹甲肝，明天就会在别的什么地方暴发伤寒、霍乱等等。新疆某些地区出现的非甲非乙型肝炎，就已被认定是人们饮用了受粪便污染的水所致。

经济搞活、放开，农村包产到户以后，许多地区的乡村合作医疗实际已经解体。预防、消毒工作更加脆弱。不仅国外出现的艾滋病随时可能传入，就连一些早已绝迹或基本控制了疾病如性病、尘肺病、血吸虫病、麻疯病、狂犬病，将重新萌发、抬头、蔓延。更为可怕的是，众多的集体、个体食品生产者、饮食行业的经营户，以及乡镇企业的食品加工厂，已成为一条主要的

食品污染渠道。他们不但出售腐烂变质的货物，而且掺假、掺杂、掺有有毒物质的活动极为猖獗。北京市曾在街头叫卖猪肉包子的小贩，因为嫌天气太热，居然把公共厕所当作工作间；卖凉粉的竟敢用洗脸水、洗脚水来洗粉，然后再放上豆腐食品色，让你真假难辨。近两年，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区连续发生不法分子用甲醇冒充工业酒精制作白酒，致使4988人中毒，129人死亡（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上海这次甲肝流行的死亡人数），38人双目失明。由于杀猪、杀牛、杀羊已经“权力下放”，以致猪囊虫、旋毛虫等牲口、家畜身上的病菌也毫不留情地传给了人，而且其发病率至今还在成百倍、千倍地增加。

面对这些猖獗的活动，面对这些被铜臭熏黑了心的罪犯，面对着这些近乎原始积累时期手工作坊式的乡镇食品企业，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追问：我们的法律到哪里去了？我们的执法人员是白吃饭的吗？为什么不用法律严厉制裁他们？！

读者恕。我们遗憾地告诉诸位（并不是外交辞令）：即使这次上海有近30万人患病，但依据我国现有的食品卫生法（细则），您也找不到一个违法者。因为按这项法律，对生食水产品除要求“鲜活”外，并无其他卫生标准。启东的毛蚶从捕捞上岸到进消费者的嘴，最多只有两天时间，真是又活又鲜，您说，谁犯法了？如果因为怀疑有肝炎或其他有害物质而强行扣压，等到两周后分离化验结果出来，毛蚶已不鲜不活、卖不出去了。到那时生产单位、经销单位还会以经济受害人的身分打上门来，控告你违犯了经济法。

我们的食品卫生监督者也并没有白吃饭。全国共有监督人员17,000多人，平均每个监督员要管300多个食品经营单位。按人口总数算，一个人要负责5~8万人的食品安全任务；而在国外一般是1个人负责1万人的比例。看上去，我们的执法队伍人均数比人家只少4~7倍，实际远远不止如此，恐怕要少10几倍、几十倍。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厂家，都有厂方自己的卫生检查系统，国家监督员只管指导和抽查。而我们呢？是天天要蹬自行车、挤公共汽车，自己找上门。除了挨白眼受奚落不算，还常常吃“闭门羹”，甚至遭到毒打。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个别粗蛮、愚昧的“土皇上”，完全依仗权势强令给不法之徒颁发卫生许可证，甚至还要时时寻机撤销这支执法队伍。谁让你砸了我的聚宝盆，抢了我的摇钱树呢？

也许有人要说：“你们洒洒洋洋，宏篇大论一番，虽不无道理，但是没有钱呵，国家穷，再呼吁也无济于事。”这种有道理的搪塞，与出了重大事故用“交学费”来敷衍的方法如出一辙。据初步估算，上海甲肝暴发流行以来，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全国1年的卫生事业费。专家们认为，平均1万人患病造成的额外开支，可相当于一个中型厂矿全年的生产总值。这就是说，上海这次甲肝流行的后果，至少相当于30座中型企业停产1年！相反，据吉林省统计，由于进行全省

免疫工作花费 300 万元，其效果是降低了 6 种疾病的发病率，节约医药费用约两亿元。我们相信，这笔帐谁都算得清，关键的还是要真正懂得人，懂得人的价值，懂得健康的价值，懂得重视医疗卫生事业也是在保护生产力，是我们顺利地奔向 2000 年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劫波过去，余波未消，人们毕竟已经开始清醒：北京为卫生防疫事业追加 200 万元的经费，上海追加了 400 万元，天津、江苏、福建、安徽……都在行动。卫生部正在考虑同有关部门拿出食品卫生法的修改草案；国家环保局已经拿出了《公元 2000 年中国近海环境污染预测与对策研究》的科学报告。而一种更深刻的对传统观念的跨越，正在艰难中悄悄进行。

战胜疾病是容易的，因为这是“治标”；而真正改变我国人民的生存环境是艰难的，因为这是“治本”。一个连对自己的生存环境、群体环境都不会保护和治理的民族，是落后愚昧的民族，她绝不会成为新世纪的创造者。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车轮的滚动。归根结底是人和与人有关的社会全方位的综合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那些拥有碧蓝的天空，明澈的江河，绿色的土地，健康的体魄的民族，才能跻身世界文明的行列；才有权利大声地说：我，迈进了 2000 年。



性，伴随生命而来。它是生命之河的源头，它是生命延续的链环。

性，是一种自然的人类需要。它就像禾苗需要阳光、雨露，人的生存需要食物与水……

性需求是生物的本能。但是，人的性爱不仅仅是纯生理本能的反应，它应当包括思维、情感、语言、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心理因素与生物学因素相互协调的作用。因此，性行为是一种生理与社会心理活动融为一体社会现象，而不纯粹是一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

然而，这条生命延续之链却出现了腐蚀的可怕的锈斑——性病。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由于世界人口中，性活跃的年轻人增多，性行为的改变，避孕手段的普遍使用，普遍的城市化和产业化，旅游事业发展及交通现代化，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性病患者不断增加，同时性传播疾病的概念亦发生了变化，范围也随之扩大了。性病已成为当今世界威胁人类生命的一个严重问题。

性病，是一种由性行为或类似行为传播的疾病，包括淋病、梅毒、生殖器疱疹、艾滋病等 10 余种。

据《世界卫生》杂志报道：“世界上每秒钟就有 4 人染上性病！”这是何等触目惊心！

警惕呵，人们！

A. 回首昨天

且让我们回到 40 年前的上海滩吧！漫步在大街小巷，常常能看到这样的镜头——

路边弄口，浓妆艳抹的妓女频送秋波；

灯影摇曳的窗口，飘出淫荡的笑声；

电线杆上贴着“包治花柳病”的布告；

……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串惊人的数字：上海解放前夕，经国民党政府注册的妓院有 518 家，有营业执照的妓女达 3505 人。暗娼、私娼散布全市各个角落，不计其数。据当时的市立性病防治所估计：性病患病率约占全市人口的 10%，达 49 万人之多。病种主要有梅毒、淋病、软下疳及性病性淋巴肉芽肿 4 种。

妓院是性病传播的“大本营”。

妓女是性病传播的“媒介体”。

这一切都在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成为历史的沉渣。在上海市民政局创设的妇女教养所里，一批又一批“烟花女”得到了免费治疗，治愈了心理与生理的创伤以后获得了新生，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

1964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胡传揆所长，向世界宣布我国基本消灭了性病。

B. 死灰复燃

当性病防治的章节从高、中等医学院课本上删去的时候；

Shelui Redian

性病在蔓延

——一份有关性病防治的报告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 80 年代、紧闭的国门徐徐打开的时候；

当试管婴儿诞生、“阿波罗”登上月球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当牛仔裤、皇冠轿车、雀巢咖啡……汹涌而来的时候；

性病，这个已被消灭了 20 余年的恶魔，竟然复活了，并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开始蔓延……

几乎在同时，广西、广东、湖北、黑龙江、福建、上海、山西、安徽……陆续发现了淋病、梅毒等性病患者，并呈现出逐年增多的发展趋势。

据对上海部分性病患者调查资料分析：女性占 24.17%，男性占 75.83%，20 至 34 岁年龄组约占总人数的 75.23%，患者中工人占 55.30%，未婚与已婚的分别占 49.67% 和 46.71%。

从事性病防治的医学专家焦虑地对我说：“这种性病的流行态势，应当引起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性病是一个社会问题，光靠卫生部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殷切地希望得到公安、司法、民政、财政、妇幼等部门的协助与支持，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性病的流行和蔓延！”

C. 病例档案之一：马路奇遇

那天傍晚，我闲着没事，上街去蹓跶，忽然，有个 30 来岁的操一口安徽话的女人，微笑着朝我走过来：“师傅，请问××路怎么走？”我顺手朝前一指：“往前走，到红绿灯那儿往左拐。”她有点迟疑，略带羞怯地问我：“师傅，我第一次来大上海，人生地不熟，麻烦您能不能带我走一段？”反正我闲着没事，也顺路，就答应了。

我们边走边聊，她似乎很热情，不时朝我投来火辣辣的目光。她贴得很近，晚风吹动她那长长的乌发，发丝不时拂到我的脸颊上，香香的。我这个尚未婚娶的男子汉，再也抵不住这异性的诱惑……

分手时，她给我留下了她的名字和地址，让我寂寞的时候去找她。

谁知，第三天早晨，我小便时觉得又胀又疼。到性病防治中心一检查，医生说是得了淋病，幸亏发现得早。于是，我整整打了 10 多天青霉素。终于给治住了。那儿的医生认真、严肃而负责，他们让我留下她的姓名和地址，进行追踪诊治，以防疾病扩散。结果得到的消息是：查无此人！

D. 性病防治中心见闻

武夷路 196 号。一座普通的院落。门口挂着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

上海市性病防治中心

上海市皮肤病防治所

我去采访的那天，上海卫生教育馆的同志正巧在这里拍摄一部性病防治宣传的电视片，摄像机的镜头正好对着一个由公安人员陪来诊治的老年犯人，几位穿着白大褂、戴着医用橡胶手套的中年医师正在给这个有性病史的犯人治疗……

接待我的谭美丽医师，是一位多年从事性病防治的中年医生，她告诉我：“1979 年，上海在消灭性病近 20 年之后又发现了第一例急性淋病。近几年发病人数急剧增多。我们性病防治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性病的监测、防治和科研工作，探索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来控制性病的流行。”

这个刚刚成立的性病防治中心，只有 8 位医师和 1 位护士，他们除了门诊以外，还要负责同各区、县性病监测小组的联系，掌握全市的发病情况，开展性病防治的宣传和科研工作。

作为诊治性病的医师，他们除了其他医务人员所具有的热诚、认真、细心的素质以外，还得为患者保密。有些一时糊涂染上性病的患者，他们常常带着负疚、焦虑、担忧的复杂而沉重的心情走到医生的面前；他们担

心把病菌传给妻子、儿女，他们担心自己的“丑闻”被单位领导、亲属、朋友知悉，他们担心……每每遇到这样的病人，医生不仅要诊治性病，更重要的是疏导心理。在那间没有旁人的治疗室里，在医生的耐心劝导下，患者将郁积于胸中的千言万语，滔滔不绝地向医生倾诉……

这是神圣的职业。
这是心灵的感应。

E. 病例档案之二：旅店“跳蚤”

我是跑供销的，长年累月在外地，跑得比较多的地方是广州、福建、西安等地。

两个月前，我在外地一家旅店住宿。那天晚上，我洗完澡，正坐在房间里看电视。忽然有人敲门，一看是个年轻美貌的姑娘，笑盈盈地看着我。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迈进了门槛，随手关上了房门。

她给我作了“自我介绍”，说是当地一个纺织厂的工人，平时爱结交朋友，想跟我这个上海人交个朋友。

说着说着，她脱去了外衣，接着，她随手关掉了台灯……

我醒来发现，她已从我的房间里消失了。我那只装着几百块钱的小钱包被她带走了。更叫我懊丧的是，回到上海以后，我发现身上出现了许多红斑。看了几个医院，都说是“过敏性皮炎”，服了不少药，但身上的红斑仍褪不掉。后来，有人介绍我去上海皮肤病防治所看看。那儿的医生给我验了血，诊断我得了梅毒。

梅毒？我被这个可怕的诊断消息吓呆了。我上图书馆查了好多医学书籍，书上说，梅毒分初期、二期和三期，如不及时治疗，就会引起各种皮肤及粘膜损害，脱发，全身性淋巴结肿大，并且通过血液遗传。我自己染上了倒算了，可怕的是，我刚结婚，妻子已怀孕，万一传给了妻子和孩子怎么办呢？

哎，都怪自己一时糊涂。
真的，是自己一时糊涂……

F. 令人不安的数据

这是上海市性病防治中心等单位举办的“性与性病知识展览”披露的几个数字：1987年上海性病发病人数比1986年上升了4.12倍，病种依次为淋病、梅毒、尖圭湿疣。另据对我国21个省、市、自治区部分发病资料分析：性病患者中男性占73.17%，女性占26.83%；20~29岁青年人占57.64%。

G. 病例档案之三：一个“同性恋”的忏悔

这是一名“同性恋”者写的一封信，也是他心灵的一段独白：

“我是怀着极其痛苦和悔恨的心情写下这封信的。

我真心地奉劝那些和我一样患有这种性变态疾病的青年快快醒来吧！

“几年前，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时机，带着十分好奇的心理，得了‘同性恋’这种性变态疾病。几年来，我一直过着那种不正常的生活。尽管我现在已结婚成家，有了孩子，但这种异常的欲念丝毫没有减退，使我从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变成了一个精神萎靡的人。

“但是，最叫我感到痛苦不堪的是，我由于不清洁的同性性交染上了梅毒，传给了妻子和孩子。我只求一时的快乐和满足而陷入了罪恶的泥坑，带给妻子和孩子的不是长久的快乐和幸福，而是永远的痛苦和不幸。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我真心地希望那些正在或即将陷入这个罪恶的泥坑的青年朋友，不要再步我的后尘了！”

H. WHO会议备忘录

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在受到“性解放”、“性自由”的冲击。

不规范的性行为，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坠入性病的漩涡。

世界卫生组织(WHO)会议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在北美，在欧洲，在加勒比地区，20~40岁的青壮年是性病袭击的主要目标，其中男性约占70%。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卫生问题，全世界都应该监视其趋势。

WHO呼吁：加速对AIDS的控制！

I. 病例档案之四：舞厅性虐

我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染上这种病！

两年前，我辞职开了一爿饭馆，经营酒、菜、饭。由于市口好，每天营业额数百元。

我今年31岁，虽已过了“而立之年”，但我不想过早地被婚姻捆住了手脚，想多挣点钱，以后有机会到国外去逛逛。

跳舞，是我的“业余爱好”。每到周末，我就把店里的事让二哥哥来代管，上舞厅消遣消遣。

在舞厅里，我认识了一个姑娘，长得很标致，舞也跳得出色，反正，她一来，许多人都要争着请她跳舞。一回生，两回熟。我在跟她的接触中了解到，她是一家宾馆卖品部的营业员，一直病休在家。

我经常约她去上海几家高级舞厅跳舞。那天跳完舞已经很晚了。我送她回家。她那妩媚的目光叫人神魂颠倒。

说是她的“家”，其实是一间10多个平方米的小屋，除一张床、一对沙发外，其他没什么了。那幽暗的灯光和迷人的眼波，使我成了她的“俘虏”……

自从那天晚上以后，我已经无法挣脱她的怀抱。在她的小屋里，我跟她一连过了几个晚上。

有一天我洗澡时，无意间发现阴茎上长了几颗粉

红色乳头状的肉疙瘩。医生说染上了一种叫做尖圭湿疣的性病病毒。

后来,医生让我动员她去医院检查,几次找她都不在家,后来听说她已经去广州了……

J. 性病发出了警告

性病,这种世界性的传染病,以其惊人的速度和顽强的复活力,正在环球蔓延。虽然无法确切地统计出全世界性病患者的总人数,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以迅猛之势传播的性病正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生命!

近年来,性病以每年增长3.12倍的速度在我国流行,并呈现出从沿海向内地、城市向农村蔓延的新趋势。

面对这一严峻的事实,人们在思索:在国门敞开的今天,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之村”,人类能否征服性病这个恶魔?

从1987年以来,我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细则,规定患有艾滋病、性病的外国人不得入境。外国人在中国居留期间,如果发现患有此类疾病,中国主管机关可以提请公安机关令其提前出境;

卫生部发出了《关于在教学活动中注意安排有关性病防治的通知》,让中青年医务工作者掌握诊治性病的有关知识;

上海市卫生局、公安局在《关于加强公共浴室卫生管理的通告》中明确规定,凡患有性病和各种传染性皮肤病的患者,禁止进入公共浴室沐浴。

上海已建立了全市性病防治的监测网,培养了一批性病防治医疗骨干,对性犯罪对象进行了普查和诊治……

然而,面对那条标明上海性病发病率逐年上升的直线,我陷入了思索的峡谷:

性观念的渐变和性行为的放纵,是导致性病发病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据对性病患者的婚姻关系调查,患者中有婚前性生活与婚后性生活的人数各占发病总人数的一半。因此,控制性病的流行与蔓延,光靠医疗卫生部门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公安、司法、民政、旅游等社会各界紧密配合,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来切断性病的传染源,才能斩断性病的魔爪。

警惕呵,人们!性病正在你的身边蔓延……

(上接第25页)

我们回答:我国电影创作上的“百花齐放”是我党早就提出来的,但真正实现还是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现在主张创作自由,是在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艺术可以自由地“争鸣”。维尔纽斯电影厂的同行听了后,显得异常的高兴。有个导演谈到他们的创作是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针,因此,从题材到形式上,显出“灵活”的一面。但这种“灵活”却被某些人曲解了,拍出了所谓的“纯电影”化的片子,结果呢?观众很少喜欢,最多评论家给以一点“注释”而已。这位导演为此深感不安,他说“把钱扔在水里,太可惜了,这简直是犯罪”。

我们参观了维尔纽斯电影厂,好客的主人请我们看了他们新拍摄的一部片子《一个女人和她的四个男人》。这是一部由小说《沙丘》改编的影片,节奏很慢却不拖沓。尤其在长镜头应用上和空间中的景物变化,获得了良好的视觉效果。另外我们还看了几部结构奇特、“时空”跳跃很大的片子,其中一部片子《事实》,它是反映卫国战争的。还有一部名叫《偶像》,这是一部反映一位画家生活的片子,片子用意识流描写手法,整个人物出场到结尾是颠倒的,“时空”是混乱的,尤其电影展现出的画家作品(抽象的)带有明显的寓意,按片中角色画家的解释,他的画是音乐。因而,片子不只是在反映一个画家,而且还在反映一个“音乐家”。导演利用现代画家和音乐家工作性质上的一致性——同是抽象艺术的表现,把两种人物有机的揉合起来,在抽象画上汇集一点。因此整部片子犹如梦魇一般,令人捉摸不定。片子的基调带有明显的意向性。该片的导演恐怕我们看不懂,竭力地想为我们解释这部片子的立意,我想他过于“认真”了,是大可不必解释的。因为我想艺术的语言,最好由艺术的本身来说明问题,而不是靠注释拔高艺术的本身。在这个电影厂,我们看了一部描写立陶宛的记录片,倒是十分精彩的,它通过立陶宛一年一度的歌唱会调演,反映了勤劳、勇敢的立陶宛人民的现实生活。立陶宛在片中,不仅是一个郁郁葱葱,犹如花园一般的美丽城市,而且在这个花园似的加盟国里,到处荡漾着劳动者的欢快歌声,影片里有一句解说词:“你种树吗?”翻译把它译成中国俗语:大意是种瓜人得瓜,种豆者得豆。立陶宛的今天幸福,靠的是全体劳动者的努力。



剪辑：俗称“剪接”。影片制作工艺过程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也是影片艺术创作过程中最后的一次再创作。

——摘自《电影艺术词典》

剪辑，这是一次艰苦的再创作，这一再创作的艰巨任务是由剪辑师和导演来共同完成的。作为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剪辑刀完全应该是操在电影艺术家手中的。

影片的剪辑，是电影家主观意识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的产物。

然而，在我们电影创作中，在许多方面，剪辑刀并不完全操在影片的主宰者——导演和剪辑师手中。

电影剪辑，在决定内容、情节的取舍方面，还存在着大量的非艺术的因素，非电影的因素。这种非艺术、非电影的因素，集中地反映在决定影片命运的领导者手中。

每当这个时候，领导者、审查者就成了影片命运的主宰。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必要的审查制度，这是不容置疑的。本文所要揭示的也就是那种束缚艺术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种种违背艺术规律的禁锢。

这种种禁锢，长期使艺术家们苦恼，使广大观众产生不满情绪；它无疑已成为繁荣、发展电影事业的一种阻碍力。

从一则“笑话”说起

在电影界，曾经流传着一则“剪辑”外国片的“笑话”。这则“笑话”是因为剪去了影片中的一个所谓“床

上镜头”而引起的。

这个“床上镜头”的情节是这样的：

女主人公和一个男青年相恋。有一天，少女便邀请这位青年来家里作客，情之所至，两人便热烈的亲吻、拥抱。紧接着，他俩躺在床上亲热地交谈起来，谈得十分投机，谈到了未来，谈到了理想……

最后，少女主动熄灭了台灯。幽幽的灯光下，少女脱衣，要求和男青年共享同枕之欢……

但是，男青年犹豫不从，他责怪少女在性的问题上太随便，如果一个少女能够如此随便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献出来的话，他很怀疑少女也可以同样随便地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另一个男人。

一场激烈的口角过后，男青年愤然起床，拉亮了台灯，拂袖而去……

这一组镜头的全过程，非常形象地反映了这位男青年在对待“性”问题上的严肃态度；也可以看出这两位青年男女之间的思想冲突。

但是，审查者却把中间的一段所谓“床上镜头”剪去了。留下了一个头和一个尾。

这一剪，却把整个内容弄颠倒了——

女青年熄灯、上床——暗转——男青年开灯、出门。

观众看完这组镜头后，得出一个结论：这对男女青年已经完成了第一次“性行为”。

这是一个十分荒唐、无知的“剪辑术”，表面上看来，它删去了一个“床上镜头”，但留下的却是意思完全相反的、更令观众能想入非非的余地

这种剪辑，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联想到我们在某些外国影片中剪去与影片内容有密切关系的所谓“暴露”、“裸体”镜头，不能不说是一种封建的、传统意识在作祟。如人们议论较多的对苏联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几位可爱的女战士“沐浴”镜头的剪辑，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美的，被理解为丑的；崇高的，被扭曲为卑下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电影审查意识的悲剧。

杨芹儿能不能死？

“杨芹儿”是影片《一个与八个》中的一位女战士。

剪辑刀下的报告

关于“杨芹儿”的命运，有一个悲壮的结局。这个结局被电影界的有识之士们一致称道为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一个“杰出”镜头。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组结尾镜头分解如下：

一个日本鬼子把刺刀捅进小狗子的胸膛，小狗子圆睁双目死去。日本鬼子骂道：“妈的，死了！”

瘦烟鬼抓住大枪，浑身上下摸索着，最后掏出了一发子弹，他哆哆嗦嗦地向枪膛里压，可怎么也压不进去，他边压子弹边向杨芹儿望去——

鬼子们一拥而上，搂着、撕着杨芹儿。杨芹儿已无力挣扎了，只是向着旷野声嘶力竭、撕人心肺地喊了一声：“大叔！”

瘦烟鬼浑身一哆嗦，一手拄着大枪，另一手掏出酒精瓶，一仰脖子喝了下去，他的眼更红了，酒和泪在手上流淌着……他扔掉瓶子，颤抖着举起了枪。

沙场上静寂得可怕。一只哆哆嗦嗦地在寻找着扳机，终于摸到了，手指的压力使扳机慢慢向后移动着，突然，枪响了……

杨芹儿无声地叭在地上……鬼子们被这一枪打懵了，四处寻找着开枪的人。瘦烟鬼不再隐蔽自己了，他平静地走出土丘，像雕塑般地站在那里，一字一眼地吼道：“老子是中国人！”说完，他扔掉大枪（已没有了子弹），脱掉小褂，扔向空中，超脱地飘然而去。几声枪响，他倒在地上……

应该指出：“大叔”——瘦烟鬼的这一枪是具有极强的震撼人心的力量的。为了使杨芹儿免受日本鬼子的蹂躏，“大叔”在万般无奈的思想搏击之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杨芹儿，使她在生命的旅程中保持了民族的尊严与圣女般的纯洁。

“这一枪”博得了电影艺术家们的赞赏，它的独具慧眼和具有深沉的思想内含的处理，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表现了青年一代导演对于人性、审美意识的思索方面，具有强烈的、独立的创作个性。

但是，即使是刚从电影学院毕业、被称之为“第五代”导演的青年电影家们，也不得不屈从于狭隘的、具有决定影片命运的审查意识。

他们为了获取审查机关的顺利通过，违心地制作了第二条胶片，送到北京。

第二条胶片的场景、情节处理是这样的：

瘦烟鬼看到被鬼子刺刀捅倒的小狗子，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杨芹儿从土包前走出，被鬼子截住，他们一拥而上，搂着、撕着杨芹儿。一鬼子狂叫：“扒光她！”杨芹儿挣扎着、撕心裂肺地大喊：“大叔！”

两声枪响，鬼子先后倒下。其余鬼子发现了瘦烟鬼，他与鬼子拼起刺刀来。杨芹儿趁其中一个鬼子不备，操起钢盔砸倒一鬼子，瘦烟鬼又乘势捅倒另一个鬼子。

一场搏击结束了。杨芹儿“咕咚”一声坐在地上；瘦烟鬼也气喘吁吁地入画，也瘫坐在地上，两人谁也顾不了谁，只是坐在那里大口地喘气。

以上两个版本，不同的艺术表现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很明显，第二个版本的处理是平庸的，它没有跳出陈旧的窠臼。

对于杨芹儿由“死”改成“活”，导演张军钊和摄制组的朋友们很不通，他们是在以求“通过”的压力下作这样的违心修改的。

张军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样片送审时，我们瞒着厂领导，把两条胶片都带到了北京，给电影界人士看第一条，给各级领导审查时看第二条。厂长知道后，批评我们给他‘捅漏子’，并下令把第一条胶片锁进了库房。现在修改后的影片用的是第二条胶片。对此，我们很不想通。”

在影片《一个与八个》的创作过程中，“杨芹儿之死”一节是整部影片受审查意识束缚的一个突出例子。至于在其他方面的意见还有许多，这些强人所难的意见，都使创作人员们处在极度矛盾与痛苦的精神状态之中。不改吧？影片要遭致“枪毙”的厄运；改吧？却都是昧着艺术良心的。张军钊说：“我们几个创作人员当时的心情是很痛苦的。几个月来，我们是一场戏一场戏、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细细地抠，对每个人物的起点、落点，对他们的每个动作细节，每句台词，每个神态，以及每个画面的造型处理，都经过了反复琢磨，精心构思。在我们看来，影片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无论拿掉哪一点，都感到特别心疼。起初，我们还想在修改问题上进行一番讨价还价。厂里有同志就劝我们：‘你们别再讨价还价了，还想没完没了地找倒霉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忍痛进行修改。”

——对一种电影现象的思考

因为，在他们看来，争取到修改权已实不易，没有被打入“冷宫”已属大幸了。但是，这样的修改会有什么好的艺术效果呢？诚如张军钊同志所说的那样：“其他地方的修改，就像是给一本书加注释，加得越多，书就越没价值。而有些注释还不准确。比如，为了使人物合乎某种标准，定要他们讲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概念化的台词，似乎这样就能使人物形象高大起来。”

这就是苛刻的剪辑刀给作者带来的苦闷与束缚。

周良蕙能不能“思春”？

著名导演白沉的“女性三部曲”之二《秋天里的春天》，是一部探讨当代伦理道德观念的优秀影片。

但是，影片的最后完成本，对于导演白沉来说，不无遗憾之处——这就周良蕙“思春”一段被“剪”掉了。

周良蕙是一位由“组织决定”嫁给市委书记的不幸的女人。初恋时，她不懂爱情，还没有尝到恋爱的甜蜜，就受着习惯势力的束缚，沿着一个女人的轨迹进入了生活：结婚、生子、养育。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她又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死了丈夫。一个“黑帮”的妻子，受尽了凌辱。

在那苦难的日子里，她和一位普通的邮递员产生了友谊，并在长期的交往中，这种友谊渐渐地发展成为爱情。这种爱情是非常纯洁和高尚的。周良蕙从儿子与他的女朋友的交往中，唤醒了她长期蕴埋在内心深处的炽烈的感情。

在最早的版本中，白沉导演特地安排了一场周良蕙“思春”的场景。这一场景拍得很美，也十分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

客厅里，欢快的舞曲响起来了，周良蕙的儿子和他的女友在轻快的乐曲中翩翩起舞。周良蕙望着这对青年人，幸福地笑了；

夜晚，盥洗室内，周良蕙在淋浴，她擦洗着身子，镜子里映照出她那丰满而光洁的肌肤，思忖着，她觉得自己的青春犹在，怀春的欲望在胸中升腾……

应该说，这一场景的展示，是充满着人性与青春的气息的，而且是非常准确地表现了周良蕙的鲜明个性，对于人们理解周良蕙、同情周良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导演在镜头的处理上也非常大胆，很有人情味。

可惜，这么一个镜头却通不过，上级机关一再要求导演剪辑。

一位懂行的电影老专家看完了样片后，激动地拉着白沉的手说：“太好了，很美，我很喜欢。”

当白沉同志告诉他：这一段要剪去的时候，这位老专家不无惋惜地说：“不要剪，这一段是整部片子中最美、最精彩的一个镜头。”

当白沉同志再三恳求领导保留这一组镜头时，领导同志却告诉他：他们经过商量，对于剪掉这一组镜头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

最后，为了不使影片中途夭折，导演不得不忍痛剪

去。

也许，在某些领导者看来，这一镜头“太露”、“不合国情”。那么，是非究竟如何呢？我想：随着时间的推延，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回答。

余悸何时消？

过严的、狭隘的审查意识，往往来自于世袭的、封闭的社会意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人们习惯于在这浓郁的封建传统意识的国度里生活，一旦有新的思想、新的行为冒尖，常常会遭致众人挞伐的厄运。而这种挞伐的形式也各种各样：传言、口诛、笔伐，或见诸报端，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强大压力下，审查者的衡片尺度于是就有形和无形地受到了牵制。大量事实证明：许多片子受到剪辑，或者“通不过”，各级领导者的意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上某些传统的思想意识。

上影厂中年女导演史蜀君同志是一位有创造风格的中年女导演。她的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青春片《失踪的女中学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历经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和阻力。这种种干扰，有来自于社会上的，也有来自于各级领导机关的。

因为她涉及的作品题材——中学生早恋，被人们视为“禁区”。

创作之初，当她在学校收集创作素材时，学校的领导拒绝提供有关素材，她好像成了“不祥之物”，几乎被赶出校门。剧本初具规模后，又有来自于各个方面的怀疑、指责，说她是“展览阴暗面”、“教唆犯”，还有的人甚至写信警告她“清醒一点”。还有的人竟然向有关领导同志写了长达数页的匿名信，说她拍“黄色片”。北京有家报纸还发表文章责问她：青春片这样的空白难道还需要填补？

在控告与舆论的一片围攻声中，领导机关还派专人来上海调查此事。一时弄得史蜀君手足无措，异常困惑。

政治气氛的时阴时晴，也给电影艺术家的创作带来了风云难测的命运。影片拍成了，正是文艺形势处于紧张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影片虽然拍成了，但被整整搁置了4个月，不让送审，怕撞在“枪口”上……

对《失踪的女中学生》所遭到的种种磨难，史蜀君同志无不感慨地说：“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之下，始终处于无法松懈的苦恼中开始拍片的。我既要考虑社会舆论，又要执行各级领导的有关意图。各级领导对一部电影作品的要求、看法常常不尽一致，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我留下了不同的缝隙，我必须寻找各级领导和社会舆论都允许我通行的缝隙钻过去。我们经常捉摸和担忧的就是片子拍出来是不是能够通过。”

艺术家们处在如此拘谨、束缚的创作气氛下，能拿出具有艺术家个性的、强烈的震撼人心力量的优秀影片吗？

黄宗英

的

债务“官司”

◆郭洁友



●法庭内外●

都说我是属云的。闯天涯，游海角，连个永久通讯处也没个准儿。

只是，云也有脚。此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广东省深圳特区南端一个小小的半岛，把我拴住了。

云是接受地上的水气蒸腾而成。至于它将化为春雨？冬雪？霜霰？还是雾散云消？云，自己又怎能做得了主？走着瞧吧。

这是黄宗英到深圳蛇口工业区之后，在一篇文章中写的题记。

冬去春来，一年又一年，岁月的河水总是匆匆地流逝。人们只能从报刊上或电视屏幕上，得知这朵“云”的一些踪迹。可是，自从她1987年初春参加中法合制的影片《花桥泪》的拍摄之后，近1年来，除了看到黄宗英监制的几集电视纪录片《中国一绝》播放外，很少得知她的行踪。喜欢读她散文的读者，也几乎看不到她的作品了。这朵“云”飘到哪里去了呢？

黄宗英病了，住进了上海的一家医院。听说开始是因为心脏病住院的，后来又得了肝炎，病魔也这样无情地纠缠着她……

自从赵丹病逝之后，黄宗英的健康情况一直不好，她有糖尿病、胆结石、心脏右束枝传导阻滞等。生病总是有病因的，对黄宗英来说，除了病因之外，她这次病

结 束 语

本文所列举的《一个与八个》、《秋天里的春天》、《失踪的女中学》等例子，在整个电影生产中，只是全豹之一斑。在过严的审查尺度与社会舆论的箝制下，遭致厄运的例子还有许多。限于篇幅，不必一一叙述。

类似像史蜀君这样处于苦恼的创作心态中的导演，也不是一二个。中年导演杨延晋同志曾对此发表意见说：“目前审查意识造成的结果，是艺术家有十分创作才华，作品中只能表现出七分。”一言以蔽之，束缚了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与才华的发挥。

因此，我们呼吁：应尽快制订一个鼓励电影艺术家放开手脚、勇于创新、电影审查条款，而且要有个长期稳定的文艺形势。在健全影片审查意识方面，切切“刀下留情”！



倒恐怕与这几年当“企业家”所遇到的风风雨雨有关。

1983年秋，黄宗英作为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去深圳参观、访问。在参观蛇口工业区时，她被那儿经济腾飞的形势深深感动，想留下来为特区的建设事业做点什么。当时，深圳和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对黄宗英的热情表示理解和欢迎，于是，黄宗英这朵“云”就轻盈地落在蛇口这片美丽的海滩上。

在蛇口工业区干什么？怎么干？要达到什么目的？开始黄宗英是朦胧的。像过去深入生活一样，她只是想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特区的建设。不久，应劳动服务公司之聘，黄宗英义务担任了宝耀公司的副经理。在这个陌生而又新鲜的岗位上，她学到了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

生活总是给人以新的启迪，随着蛇口工业区的信息反馈，一个极其大胆的设想，突然在黄宗英的心中萌生了。她想尝试以企业方式办文化事业，想在深圳特区这片土地上发展影视事业。正在这时，一位法国华侨很欣赏黄宗英的志愿，决意出资以借贷方式支持她创业。黄宗英便先后在香港和蛇口创办了两家公司，在香港的叫天下影视公司，在蛇口的叫都乐文化娱乐公司。

作为一个中外合资企业，都乐文化娱乐公司于1984年9月在蛇口开业了。黄宗英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这个公司竟先后拍摄或合作拍摄了《大汉风情》、《蛇口人》、《深圳风情录》、《大明星》、《无情的情人》、《朝霞与晚霞的对话》等电影、电视片。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都乐公司所拍的电影、电视片有一些没有被批准发行。一部电影要投资几十万，一部电视片也要投资几万，电影、电视片不准发行，都乐公司在经济上便陷入了困境。

这是黄宗英没有想到的，她开始感受到办企业的艰辛和苦恼。想法总是想法，想法再好与现实总是有一段距离，而且有时这距离是十分遥远的。

都乐公司为了进口影视制作设备，通过蛇口工业区的担保人曾向中国银行借款37万余美元。看到都乐公司这种经济状况，担保人不愿再担保了。为了还清银行的借款，黄宗英只好向北京中国租赁公司贷款。这笔巨额贷款进行得很顺利，很快37万余美元就由中国租赁公司寄往香港了。1985年9月，黄宗英委托她好友都乐公司的副董事长薛某（港商）立刻去香港办理这项事。薛某回到香港后便收到了这笔巨款，但他没有转给都乐公司。起初几天还在香港露面，很快竟失踪了。都乐公司不断去电话询问，香港的股东也焦急地寻找，却找不到薛某的踪影。

许多人都知道薛某是黄宗英的好友，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薛某身为红卫兵，曾给过黄宗英同情和帮助，黄宗英称他是知己的学生。因此，薛某的失踪，黄宗英起初并不相信，一个多年的好友，又是自己十分信任的人，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呢？可是，半个月之后，仍没有

得到薛的任何消息，黄宗英失去了往日的镇静，开始不安和困惑了。她意识到薛某的失踪，意味着巨款的丢失，这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她仿佛在白天做一个可怕的恶梦。

这时，谣传不断飞来，有的说薛某在澳门的赌场将这笔美元巨款输光了，有的说薛某带着这笔钱外逃了……

对这件事，蛇口工业区非常关注和重视，找黄宗英了解情况，并希望她尽一切努力设法找到薛某。

寻找归寻找，薛某还是没有音信。有人怀疑黄宗英是薛某的同谋。

1986年1月，黄宗英的胆结石和胆囊炎发作了，当时为了筹划拍摄山东的《中国一绝》，她刚刚回到北京，便住进了首都医院。由于病情较严重，医生给她作了胆囊摘除手术。这时，社会上谣传黄宗英丢失了美金巨款、都乐公司破产了，她已经自杀……

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黄宗英的一篇文章《想你，阿胡子》，人们才知道她没有死。香港的《新报》也在头版发了一条新闻——与好友合组公司弄至债务缠身，大陆女星黄宗英惨遭港人卷入巨款。一度传出自杀，证实乃属谣言……

3个月后，薛某竟在香港出现了，并与在香港的股东见了面，还给中国租赁公司和蛇口工业区写了信，说明这笔贷款他用去做生意，被人骗走了，他会设法逐步偿还。

1986年4月初，黄宗英在杭州花家山宾馆休养时，薛某在中国租赁公司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在杭州见到了黄宗英。这个带着巨额贷款曾一度失踪的学生见到手术后身体十分虚弱的黄老师，极其尴尬，没说几句话便羞愧地哭了起来。他在杭州写下了向中国租赁公司分期归还贷款的保证。

保证是写了，可是薛某并没有如期归还贷款利息。钱还不上，这就是一件经济上的大案，黄宗英为此一直焦虑不安。

转眼1987年来临了，薛某竟带着200多万人民币来到了北京，归还了中国租赁公司的全部贷款。这场惊心动魄的事件，才算落下了帷幕。

1985年秋天，黄宗英开始筹划为地质部拍摄电视报告文学片《地球，你好》。这部电视报告文学片按合同应该在1986年春天开拍，由于黄宗英生病和都乐公司一些事务要处理，这件事一拖再拖，地质部感到遗憾，黄宗英也无奈，只能表示歉意。对黄宗英的处境地质部是理解的，并且表示关心和同情。1986年7月，黄宗英成立了《地球，你好》摄制组，正要从北京启程飞往新疆拍片的时候，地质部突然决定不拍摄《地球，你好》了，要求都乐公司归还早已寄出的拍摄费。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都乐公司迟迟未还钱。无论与都乐公司联系或与黄宗英联系，都得不到明确的答复。这使地质部非常伤脑筋，这样一笔公款不能总是无限期地拖延着，听说为了追回这笔拍摄费，地质部已

向法院起诉了。

拍摄电视报告文学片《地球，你好》，地质部和都乐公司是签过合同的，究竟是哪家不按合同办事？造成的损失由哪家负责？事实将会做出公正的判定。黄宗英代表都乐公司在合同上签过字，作为当事人，她的苦衷是可想而知的。

在黄宗英的生活里，总是有那样一些突来的风波，让人感到意外。

1986年11月，上海的报纸登出了一条新闻，周璇次子周伟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帮助他追回由黄宗英保存的他母亲的遗产。霎时，全国各地报刊都转载这条新闻或刊登有关文章。

著名电影明星周璇是1950年8月从香港回到上海的，由于生活上的不幸遭遇，又正在怀孕，精神和身体都不好，朋友们都为她的健康担心。不久，周璇的儿子出生了，起名叫周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影剧界朋友们的爱护中，他们母子快乐地生活着。后来，周璇在拍摄电影《和平鸽》时，突然发了精神病。她生病之后，所有的财物由上海电影局保管，黄宗英受组织上的委托，将周民接到了家中抚养。

周璇在拍摄电影《和平鸽》时，认识了搞美工的唐棣，不久他们就打得火热。周璇在病中竟怀孕了，当时，周璇的养母向法院告了唐棣，唐棣因诱奸精神病妇女和诈骗钱财罪被判刑。1952年8月，周璇又生了一个男孩，随生父的姓起名叫唐启伟。唐棣出狱后就把唐启伟领走了。周璇病逝后的第二年，即1959年，法院找到上海市电影局，说有一个孤儿叫唐启伟，是周璇的儿子，要交给电影局。电影局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后来一家姓毕的夫妇愿领养这个孤儿，并办了领养手续。过了几个月，这对夫妇又不愿领养这个养子了，赵丹和黄宗英便又收留了这个叫毕富伟的孩子，改名叫周伟。

在周璇生病期间，为她保管财物的人盗窃了周璇的大量财物，沦为可耻的罪犯。周璇在香港还有一家唱片公司的版权税款，据有关文章披露，到60年代中期，仍按合同规定寄至上海。这笔钱是由上海电影局保管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冻结过，1982年电影局不管了，交给了黄宗英。这笔钱有多少？说法不一，有人说10几万，有人说几万，反正电影局交给黄宗英多少钱是应该清清楚楚的，更是有据可查的。周伟要求黄宗英归还他母亲的遗产，主要是指这笔版权税款。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周伟起诉的这件遗产案之后，海内外的报纸都争刊这条新闻。至于1959年黄宗英收养的周伟，是不是周璇1952年8月在华山路枕流公寓生的那个孩子，是能够查得清楚的。不过，黄宗英是把周伟当作周璇的孩子收养的，不然她怎么会收养他呢？当然，黄宗英不会想到周伟20多年之后竟同她打官司。1986年11月，黄宗英曾对她的法律顾问表示：“我相信法院会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妥善的处理。”黄宗英感到，一个由她抚养长大的孩子离开了他

的母亲，这种感受只有一个做过母亲的人、懂得母亲感情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不知为什么这件遗产案还没有了结，难道这件案子真的那么复杂、那么神秘吗？难道真有那么多谜中之谜吗？时间无情地流逝，这场官司还要拖到何年何月呢？对黄宗英来说，她是被告人，这场官司不结案，被告人是无法解脱的。

两年来，令黄宗英烦恼和困惑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她负责总监制的多集电视纪录片《中国一绝》。这是一部耗资很大的电视片，在都乐公司经济上陷入困境的时刻，黄宗英得到了山东、杭州、常州、南通、无锡等地的支援，这样，她就欠了一些“内债”。目前，已制作完成的20集《中国一绝》，如果能够外销出去，她就可以收回投资，还清“内债”了。黄宗英1年前曾对记者说过，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泰国等都来索片，不知什么原因至今一集也没有卖出。片子卖不出，她就无法还“债”，几十万人民币总是要还给人家的，怎么办？黄宗英一直在努力，但希望却是比较渺茫的。

几年来，这么多的事情继续着黄宗英，她从一个漩涡里旋出，又被另一个漩涡旋进。苦恼、困惑像影子一样，紧跟着她。生活中的风波，仿佛是舞台上的追光，一直在追着她，追着她……

于是，我想起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一段话：假若苦难不是我们生活之急切和直接的内蕴，那么，我们的生存与它在尘世中的实际内蕴就极不适合了：因为，要把遍布尘世的无穷无尽的冲突以及那些由需求和与生命本身相关联的苦恼所发生的东西，仅仅看作是毫无目的或纯属偶然的情形，那就不免荒诞了……

看来，黄宗英不仅是一朵闯天涯，游海角，连个永久通讯处也没个准儿的“云”，而且还是一朵正在被苦恼和困惑纠缠着的“云”。

善良的人们期望她尽快地恢复健康，让这朵“云”在多风多雨的生活中，继续谱写自己的命运交响曲。



含着微笑 离婚

■蔡洪平

●当代生活●

张静兰，从1955年22岁起就开始在民政部门从事各种协议离婚。我见到她，她显得很疲倦，老花眼镜的两侧，鱼尾纹向后放射着，和一些老年女干部一样，她有一种端庄慈祥的神态。她告诉我：

“我还有4个月就要退休了，这碗饭，我越来越难吃，也越来越好吃。你要了解我说的意思，我可以破例地给你看看我的工作手记，但一不要遗失；二要保密，忘记真名。”

说着她从办公室下面的柜子里取出了一大叠笔记本，已发了黄的，封面上有毛主席语录的，也有华国锋照片的，当然也有彩条绸缎面的。

我们姑且叫她张阿姨吧，她边拿笔记边说：扳指头算算，我当民政干部几十年，还当了4次先进呢。去北京向外国记者都介绍过经验，几千对要离婚的夫妇在我的劝解下破镜重圆。可现在不行了，80年代啊！喏，你看看1986~1987年的日记吧。

我翻着张阿姨像铅印一样整齐、细小的字句，看到了人们常说的50年代细致踏实的工作作风。这些手记，简直就是一本本书，一本本现代公民婚姻演义，我整页整段地抄下来，心里琢磨着以后拿到稿费后一定要对张阿姨有所表示。

我敢说，就凭这日记，她就可当女劳模。

1987年10月10日 星期六 晴天

我们民政工作有一条规定，凡是前来离婚的，一定

要热心调解，要怀着对人民、对阶级兄弟的深厚友情去做工作。我们有一句口号，叫做“挽救一对夫妻，就是对社会作了一份贡献”。婚姻法也明确规定，离婚须经调解，调解无效方可判离，为此，我和因病去世的苏美宝大姐一起，发明了调解十二法。显然当时没有什么专利，但在北京召开的民政工作交流会上作了经验介绍，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本周办理了17对离婚手续，都这份“德行”，来势那么凶，只有5对被调下来了。说不定又是瞎子点灯，过几天又来磨蹭。

以前那会儿前来离婚的，我们把那感人的道理正反横竖一讲，“调解十二法”一用，纵有铁面心肝的也有几分回心转意，进入80年代后，离婚人数多起来了，我们一看不妙，搞了个“绝招”对付着，弄一份打印的离婚咨询表。那些为一些偶然的琐事闹着要离婚的“发寒热”，离婚夫妇，心口憋足了气，两眼喷火，瞧那劲儿，黄浦江也敢跳，这类“发寒热”离婚到了我们这里，好办，先让两人别嚷嚷，把他们分开谈。各自谈完了，把对方说得啥也不是，然后我们见缝插针再做调解工作，一边调解，一边给每人一张离婚咨询表格，让他们按照表上的栏目，一一填上并签字。不少气头上的夫妇弄不清这是一张咨询表，以为是正式表，填完就离了，这一下心里开始软了，伤心了。但心在软，却硬着面子手还在填，这眼泪啊，像珍珠一般扑簌簌往纸上滚。我见过有的男人嘴上硬，哭起来比女人还厉害，声音呜呜的。这